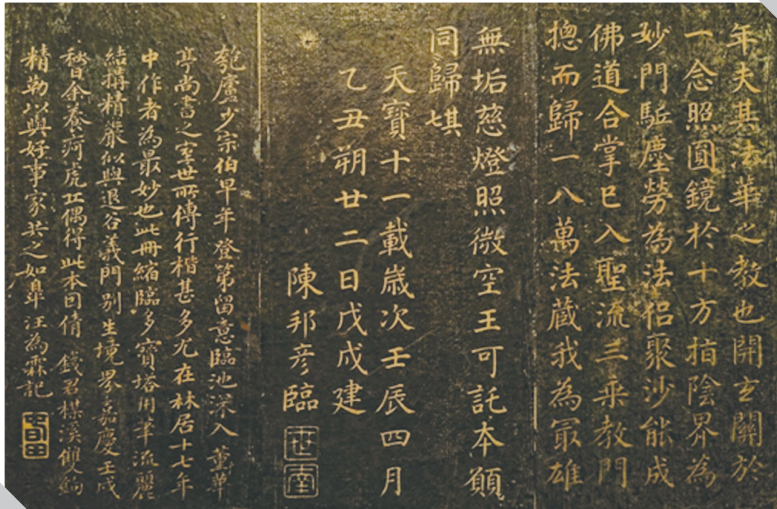




# 汪为霖与《小楷多宝塔碑帖》

◎徐继康

1992年9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楷多宝塔碑字帖》,印数6000本。《多宝塔碑》是颜真卿四十四岁时所写,其碑拓遍传天下,为历代临学书法的经典范本,堪称中国书法史上最富盛誉的名碑之一。众所周知,此碑是典型的大楷,原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并非小楷,又何来的小楷字帖呢?其实说起来,这本小楷碑帖倒与丰利汪为霖有着莫大的关系。



《小楷多宝塔碑》拓本

嘉庆七年(1802),岁在壬戌,这是汪为霖因病从广西桂平梧郁道兼管省盐法事任上回籍调治的第四年,此年他正好四十岁。自十七岁进京选得刑部湖广司郎中以来,他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后来又在广西思恩府、镇安府两任知府上十年,久离乡井,让他思念成疾。所以,他这次回到丰利后,真有如鱼翔浅底、倦鸟归林。在与家人厮守相依之暇,他于文园种竹、补篱、种花,整理好白、紫古藤架,重开了文园诗会。在上一年,汪为霖开始出游,春到无锡寄畅园,在惠山寺新试茶。复至吴门,且饮百盏姑苏酒。七月再赴金陵,与赵翼、孙星衍同登牛首山,又结识了闻名已久的洪亮吉,一起共游清凉山。在南京,他还参加了由冒冠德招集的秦淮水榭雅集,为其所购的《水绘园诗册》题诗,与会者达四十四人,集一时之胜。此年,他还被朝廷覃恩浩授了朝议大夫。一切正如他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山翠扑衣如迁客,泉声洗耳胜弹筝。”

也许是苏州景色清幽,也许是苏州人文渊薮,嘉庆七年这一年,汪为霖长时间待在苏州。目前,除了看到此年夏天他在丰利徐佩的斋中赏玉兰、写图题诗之外,其他的活动轨迹皆在苏州,最起码从七月一直住到九月底,就连他四十岁的生日都在那里度过的。九月七日前后,他曾游山三日,作诗多首,虽然感觉“岁月如驰、流光若驶”,但还是觉得“人生乐事不过春秋佳节登山临水而能不为尘世风雨所阻”,实乃一大幸事。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这一年的七月,汪为霖还遇到了一件开心事,他在虎丘养病之时,得到了一本康熙时名臣陈邦彦用小楷缩临的颜真卿《多宝塔》册页真迹。陈邦彦,字世南,号鲍庐,一号春晖,海宁盐官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后升为侍读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的文名很盛,辑有《全唐文》《宋诗补遗》,并奉敕编《佩文斋历代题画诗类例》,著有

《墨庄小稿》《春驹小谱》《春晖堂集》等。他不仅诗典雅有致,书法更是名扬天下,在侍直内廷时,常常奉命校读御制碑版文并奉敕缮写,《康熙字典》御制序、《御制圆明园十景诗》均出自他的手笔。康熙皇帝对他的“宠遇之隆一时无两”,以至“侯门相第,必得其书以为快;夷酋土司,咸以得其尺幅作为传家之宝”,当时仅南方假冒、摹仿他笔迹的人就有百人之多。他的书法以小楷为工,行草宗法二王,晚年深得董其昌笔意,所作几可乱真,而这本小楷册页却非王非董,临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与平日疏朗秀润不同的是,此册写得丰厚遒美、腴润沉稳,十分秀美刚劲,有字字珠玑之感。汪为霖爱不释手,他在册尾这样跋道:

鲍庐少宗伯早年登第,留意临池,深入董华亭尚书之室,世传行楷甚多,尤在林居十七年中,作者为最妙也!此册缩临《多宝塔》,用笔流利,结构精严,似与退谷、义门别生境界。

其时,汪为霖的好友孙星衍、钱泳、张增、徐大榕、方临、顾金寿等人都在苏州。七月十五日那天,他邀请他们一起到虎丘精舍来欣赏此本册页,大家看后,个个赞不绝口。此外还有汪士相、陈广宁二人,也观赏了这件小楷精品。他们皆为陈邦彦精湛的书艺所折服。

看到钱泳,汪为霖不由灵机一动,决定请这位金匱的钱梅溪先生将此帖双钩精勒,缩摹拓行。钱泳比汪为霖大四岁,虽然没有功名,却是名满天下的名士,一生以游幕为生,勤于著述,鼎鼎大名的《履园丛话》就是他的大作,如今钓鱼岛归属铁证也出于他的手抄文稿《记事珠》。他多才多艺,能诗、善琴,工书,尤擅长长隶。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钩勒,尤长于缩临,以书写、钩勒、摹刻、捶拓等一整套出色技艺而名震海内,所摹先秦汉唐金石碑刻不下数十上百种,他摹刻的《攀云阁帖》《诒晋斋帖》《清爱堂帖》《松雪斋

帖》《经训堂帖》《抱冲斋帖》《澄清堂帖》等帖风行海内,一生所刻碑帖数量之多、品类之盛、质量之高,清代无人能出其右。他与汪为霖是多年的好友,两人经常诗文唱酬。道光二年(1822),就是汪为霖去世那一年的三月,钱泳还渡江前往文园,看望满头白发的汪为霖,留下《赠汪春田观察》五律两首后惆怅离去。汪为霖赠给他的《咏风车扇》诗札为田家英收藏,后来还被《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一书印为了封面。这次在苏州遇到了心仪的书法佳作,遇见天下第一摹刻高人,汪为霖岂能错过。他请钱泳精心摹拓,其目的就是“以与好事家共之”,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法册页。

好友的拜托,钱泳当然全力以赴。他以灯取影,用较为透明的纸蒙在字帖上,把字的轮廓钩摹下来,然后在枣木板上按样刻绘,再捶拓成片,从而装订成册。自此以后,久负盛名的书林瑰宝《多宝塔碑》便有了小楷拓本传世。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汪为霖,这世上就不会有《小楷多宝塔碑》拓本。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书法艺术大热,北京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欣赏的需要,现根据清拓本影印出版”。为了不失原貌,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强调:“帖中模糊残之处一仍其旧。”由此可见,这本碑帖的清拓本并不多见,就连北京出版社也没有选择添补的机会。

几年前,启东书友王辉有缘购得《小楷多宝塔碑》原拓本一件,为残本,虽然前面失去几页,但陈邦彦大部分临作以及汪为霖、汪士相、陈广宁、钱泳的题跋都在,其价值显而易见。王兄知道我研究汪为霖,遂以此拓与我一本冯善征的《达庐诗录》相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前不久,我又发现了此碑帖的原拓本残件三片,汪为霖的那一页题跋完整无缺,立即掏钱买下。对我而言,这也算奇缘了。



## 五里墩

◎林炳堂

在海门余东与包场两镇之间,有一个叫五里墩的地方,从前也是通东的一个小镇。小镇北边紧挨着老运盐河,南边有通吕公路经过,水陆交通便利,小镇也很繁荣。

五里墩原来是“潮来万里浪,潮退千步沙”的一块滩涂。因这里靠近海边,不少渔民经常下海捕捞,以获取鱼、虾、蟹等海产品为生。此处江海相连,风高浪急,经常有渔民来不及返回而被潮水吞噬生命。后来,人们选择高处筑起土墩,遇有大风怪潮时,渔民就可到土墩避难,因此人们称之为“救命墩”。“救命墩”上人越聚越多,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村落,距今有两三百年历史。因西距余东镇五里,又是海上第一墩,所以称之为“五里墩”。

五里墩有一条200多米的东大街。街两侧民居建筑挨次落成。街面由石块铺设,呈龟背形。街上有杂货店、茶食店、药店、酒店、茶馆、理发店、肉铺、染坊等,市场繁荣,街市热闹。清乾隆年间,街东首建有一城隍庙。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创办的“通州大达内河轮船”开航后,五里墩设有大达轮船码头。民国九年,通吕公路告竣,张謇创办的通知海长途汽车开通,途经五里墩。公路旁建有一八角凉亭,供路人歇息,故这里也称“八角亭”。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镇上有城镇居民200多人。

五里墩由于水陆交通便捷,大革命时期,刘瑞龙领导的红十四军一支队在此活动频繁,发展和扩大了党的组织。1940年,新四军在这里与徐承德顽部展开一场激战。是年12月30日下午,徐承德为阻击新四军,派出了两个排60多人来到五里墩,在要道口设卡布防,并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至晚上9时,新四军先头部队吹响了冲锋号,向五里墩的顽军发起了冲锋。徐部的两个排一看新四军主力部队到来,顿时慌了手脚,不战而退,拖着枪逃命。有的顽军想抵抗,被击毙在公路旁。新四军见敌人逃走,便在五里墩安营扎寨。第二天清晨,在五里墩东庙场上,新四军和当地群众近千人召开了攻打余东镇的战前动员大会,战士们全副武装、整装待发,向敌伪发起激战。

五里墩也是一个英雄之地。1943年,我东南行署的税务干部梁庄烈,在一次收税返回途中遭遇敌人,不幸被捕。在敌人酷刑下,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壮烈牺牲。当地把五里墩所在村命名为庄烈村。解放战争时期,东南警卫团在此进行过三次伏击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解放余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因区域经济发展演变,五里墩逐渐衰落。